

《聆听:与一只鸟相遇的最好方式》

作者: 西蒙·巴恩斯
出版社: 新星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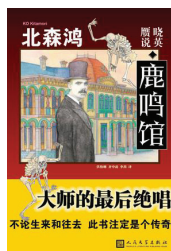
西蒙·巴恩斯将带你开始一场由冬入春的听鸟之旅。旅途中,你会学到关于鸟鸣的常识;你会逐渐从一场大合唱中区分出红胸鸽、大山雀、柳莺、戴菊、白鹡鸰的歌喉;你会听到生命的节律、地球的回音。



《人生忽如寄》

作者: 梁实秋
出版社: 天津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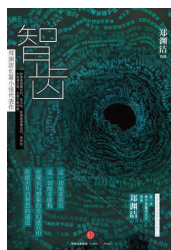
梁实秋用自己的文字探入彼世界,清楚地勾勒出其所蕴的思想力,引我们靠近那些坚守理智的生活场景,如是,从一个满世界充斥无厘头和嬉闹的后现代时代中突围出来。面对当下浮躁的现实境遇,众人对待的方式有所不同。梁实秋安于寂寞,孤独时他的想象力更加汪洋恣肆,加上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以及思想上严格自省的态度,弥补了他对事物理解上客观存在的有限性,扩张了他的精神世界。



《晓英·履说·鹿鸣馆》

作者: 北森鸿
出版社: 人民文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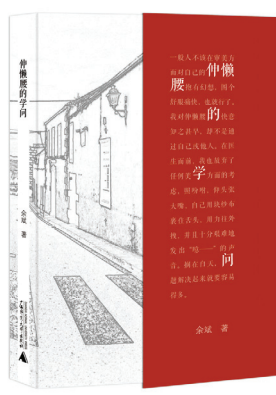
一位作家为了取材而选择调查鹿鸣馆,却发现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谜团,这个历史上最有名的建筑,为何什么资料都没有留下,那个众所期待的建筑师中村青司,为什么放弃了他最喜欢的建造风格?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造成了这般的格局?在迷雾一般的现实中,作家能寻找到真相吗?



《智齿》

作者: 郑渊洁
出版社: 中信出版社

讲述了荒诞畅销书作家梁功辰,一直以来深受读者欢迎。令人意想不到的,有一天他在医生的劝告下拔除智齿后,突然丧失了写作才能。原来,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,是由于他们在拥有智齿的同时,还拥有连接智齿和大脑的黄金通道。已经和他签约出版新书的出版社心急如焚,梁功辰更是惶惶不可终日。梁功辰迫切地想要重新安装这颗智齿,来恢复自身的写作才能。与此同时,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也想利用这颗智齿来为自己赚钱。



《喝酒的故事》

《有书和没书的日子》

《伸懒腰的学问》

作者: 余斌
出版社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酒事、书事、闲事

文 | 刘勃 图 | 资料

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大学扩招,南京多了几家民办学院,因此我这样的人也还有学可上。那时我们的系主任原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前辈,动员了许多当年的朋友和学生来兼课,这便导致了一个后果:我系的宣传手册上显示的师资队伍蔚为壮观,但实际教学效果却颇可虑。多数学生对老教授关注的问题毫无兴趣,也听不懂。

余斌老师来教我们外国文学,彼时他年未不惑,按高校里对年轻的宽界定,尚属“青椒”一枚。但进教室时倒极笃定,不带教材,亦无讲稿,进教室后将茶杯往桌上一放,白眼一翻望向天花板,开始讲课。说到重要的人名、书名,也会板书,但绝无排列次序,更不会标注一二三四甲乙丙丁之类的纲目,弄得前排少数认真记笔记的女生无所适从。

随后一来二去,跟他也有些熟悉,便厚起脸皮讨要他的著作看。下一周他带了两本给我,一本读书随笔集,说是送我;一本《张爱玲传》,说了两点:第一,这是盗版,因为正版他也没有了;第二,这本要还,因为盗版他也只有这一本。

后来,我把书还他,说倒是更喜欢那本随笔集,不料他竟很高兴——被人介绍,就说是大陆第一本《张爱玲传》的作者,这是他不爽而无奈已久的事了。

因为于他而言,书、酒、闲三者,本来就密不可分。是彼时写彼时之事,是那个年代生活的剪影。

《张爱玲传》当然是好看的。九十年代,张迷的声势已大,和余老师作传时的冷落的景象大不相同。余老师使用的材料,也不知道又被多少人用过,但他这本书仍然无可取代。比如一般论者爱说父亲对张爱玲的伤害,余老师却注意到张爱玲写到父亲,字里行间自有温情在,反是母亲的故作矫情刻薄苛求,对张的伤害来得更大。这便是小资情调的读者看不到也不乐见的。立足有限材料,结合当时社会情境,以世故人情体察,前者需要学者功夫,后者需要文心洞鉴。《张传》中这两种才能彼此生发,绞动如齿轮。但我以为这种双剑合璧,若是不拘什么题材,随笔点染议论风发,反而更有趣。

余老师的电脑经常坏掉,存稿便损失大半,于是把文章存在网上备份。我就这样在网上读他的文章,不知不觉把自己也读成一个写书、教书的人。最近翻看余老师《喝酒的故事》《有书和没书的日子》《伸懒腰的学问》三种随笔,其实倒是重温十多年来阅读的感受。

他曾聊起,书名本来就是更简单的,那书是什么内容,就更加显豁。但我觉得这也就是勉强划分,因为于他而言,书、酒、闲三者,本来就密不可分。但同一本书里的文章,差异却往往极大。

有些文章是彼时写彼时之事彼时之感,保存了一些那个年代生活的剪影。那时各种新的传播和营销手段刚刚出现,由此发出的感慨,今天看来怕已不免觉得大惊小怪,毕竟,如今我们被微博、朋友圈轮番轰炸,大家都有了点已经沧海的深沉。但一惊一乍,本也是上个世纪末最显著的景观之一。

更有意思的还是那些回忆往昔的文字,不是常见的感伤怀旧文的路子,散淡幽默,略带嘲讽,写少年时的经历与心事,便有些迅翁《朝花夕拾》的意味。昔日浮躁凌厉的“我”与今日理智而带点倦意的“我”正堪对照。另外写酒写书,都见得醉翁之意不在酒,功夫在书外,由此带出的事迹与心迹,三十年来的社会变迁,宛在其中。

这些年“民国”在坊间大热,圈内大约未必会有很多共鸣。当代作家对民国素不服气,别说成名人物,当年随便在街头巷尾拉个文学青年,夸他的作品有民国大师的风范,都会见到一脸受到侮辱的表情。学者们态度温和些,但也未必不以为民国是沾了时代的光,新学草创,随便丢出一篇论文就算独辟穷荒可以开宗立派,真看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论断,自家后出转精也并不稀奇。

不过有一点大概无甚异词,就是现在学者做率性文章,那是真不如民国了。民国人物,兼有学者、文人身份是常见现象。现在这两个群体则渐行渐远,常竟不过是鸡犬之声相闻而已。何以如此?别的原因也可以扯上许多,但这实是现代化分工的必然结果,确认包括中文系在内的研究,与创作并不直接相关,对厘清许多问题,也只有好处。如此结果是大势所趋,只是从个人的阅读经验说,不免遗憾罢了。

余老师的文章,某些角度看倒是上接民国学人的文脉——虽然他对民国未见得特别欣赏,但正像那些被当做“民国范”典型的人物,也多不待见民国,有时我觉得竟存在这样一个悖论,不推崇民国范,乃是民国范的必要因素之一。不过余老师少年时代近乎散养(在这三本书里体现得极鲜明),所以和老一辈比,文章醇厚或者稍欠,却多了些野逸气罢了。

能有这样的风格,一来是他个性使然,二来恐怕也是他的年轻时代,正是大学最穷而最无压力的时候,所以由得他如此率性。更年轻一辈的学人,写随笔其实也不乏写得精彩的,但总是不免看出更多学术规训的痕迹:举证必丽雁雁行,分析必步步为营,行文专以简明直质为上,偶而穿插一二段子而已。这自然也是极好的文章,但若独沾此一味,却也不免单调。于散漫中见神韵,疏淡中露锋芒的文字,将来或者是越来越难读到了吧。